DOI:10.13317/j.cnki.jdskxb.2010.04.001
2010年 7月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ly 2010
第 12卷 第 4期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2 No.4

文学从来都不是很“重要”①

张隆溪[1],梁建东[2]
(1.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香港 999077;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削弱文学对人类的吸引力;东西方的文学经典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峰,值得现代的读者反复地阅读与研究;当代的文学研究应该积极地吸收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的优秀成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丰富和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并提升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文学;经典;历史叙事;宗教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0)04—0001—05

梁建东(以下简称梁):在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文学却日趋边缘,文学还能像它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发挥着重要的效应吗?它对于我们而言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隆溪(以下简称张):在历史上,文学似乎从来都不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读文学,都听文学家的话,这样的时代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即便是在文风兴盛的江南,文人往往都是不得意的,好的文学作品也往往是由不得意的文人创作出来的。宋代的欧阳修曾经为梅尧臣写过一篇序,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我听说诗人飞黄腾达的很少,穷愁潦倒的却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解释道,“非诗之能穷人”,不是诗把人变得潦倒,而是“殆穷者而后工也”,诗人只有倒霉了之后,才能写出好诗,而且“愈穷则愈工”。“诗可以怨”的基本意思是:诗人有痛苦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是这个道理。你看拙政园也好,留园也好,都是由陆龟蒙、文征明、唐寅这样一些失意文人修建的,园林可以让他们“自放于山水之间”,修筑高墙大院把自己与喧嚣的外界隔离开来,可他们的书读得再好、文章写得再漂亮,对朝政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不过在传统上,文学有精神价值,也能得到一般人的尊重。

梁:筑园隐逸确实是江南很多文人、才子或失意官员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网师园就印证了您的这种说法,所谓“网师”也就是渔夫、渔翁之意,熟悉中国古代诗词的人大概都能明白“渔隐”的意思。

张:所以说,文学在实际政治上的用途从来都不大,文人感觉到失落也是必然的。文学不能以一种激烈、直接的方式对个人和社会施加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精神的影响与物质、权势的影响的区别就在这里。不管是中国文学也好,外国文学也好,它们都不会直接与个人的现实生活发生什么联系,因为文学建构的只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往往是完美的,我们读唐诗、读《红楼梦》,它们好像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却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内在的心灵。文学传递出来的信息,它所传递的文化价值以及审美经验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可是你看他编订的《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又是多么巨大?苏格拉底也是如此啊,他被雅典人判了死刑,饮毒药死在了监狱里,可是你看他对西方的影响又有多大?相对而言,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到现在反而无人知晓了。杜甫写过一首非常有趣的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

收稿日期:2010—04—01
作者简介: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从事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梁建东,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美国文学研究。
①本文为张隆溪教授 2009年 11月应邀到苏州大学讲学期间与文学院梁建东的学术对话。

们这些后人在读了这首诗之后就常常会问:“这黄四娘是什么样的人啊?”你看,正是因为有了杜甫,每一个读过这首诗的人就都会在心里记住黄四娘这个人,她千古留名了,可是当时那些达官贵人又是谁呢?我们这些读者其实一点都不会关心。文学的影响就在这里,它在精神方面的影响也表现在这里。

诚然,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一种很大的挑战。现在大家都已经变得不太阅读书面文本了,当然我们在上网的时候也会阅读文本,但是那种传统的阅读方式,也就是捧着一本书来看的方式,好像正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传统的文学阅读会不会消亡呢?我想这话现在还不能说得太绝对。在发达国家,网络的影响更加广泛,早就有人在抱怨年轻人整天沉迷于网上游戏、电影、聊天,不太看书了,可是据说现在美国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书籍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甚至还一年比一年多。我们且先不管这些书籍的内容如何,可至少这也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在看书啊,不然的话图书市场早就萎缩了。市场是说实话的,有需要才会有生产。所以,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现在就轻易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是看看再说吧!

梁:新的数字时代正在到来,很多人开始通过电脑或各种手持数码工具来进行阅读,您认为这股潮流将会对文学阅读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张:确实会有些影响,但是究竟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很难说。我们处于这个潮流当中,往往就会抱怨比较多。其实,每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在刚出现的时候都会招致不少抱怨。在中古时候,书籍都是手抄本,印刷术之后,很多人开始抱怨读书的人太多了,反而降低了书的价值;后来打字机出现了,又有人痛心疾首,以为书写要完蛋了,书写要终结了;当电脑出现之后,招致的批评就更多、更激烈了。我们现在无法估量电子技术的发展会对我们的阅读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其实际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现在的数码产品从学习到娱乐等方面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大,他们已经不再像我们以前那样读书了,但也不像我们以前那么单一,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由此产生的影响也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另外,文学已经退出了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因此文学阅读自然就不会是非常大众化的,文学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读者产生影响了。但我相信无论时代、科技如何发展,喜爱文学的人还是依然会去阅读文学作品,因为它的魅力不是科技可以轻易遮蔽的。

梁:还有人悲观地认为过度的图像化会对文字阅读造成压制,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一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我相信有些人会这样讲,但是这些说法也不见得都很有道理。至少在我看来,视觉或图像恰好可以和文字结合起来深化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我下学期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开一门课,专门讲西方文化当中不同门类的一些重要的艺术作品。其中我就会讲到戏剧《哈姆莱特》中的一段内容。哈姆莱特从英国回来以后,在坟场上看到几个挖坟的人,然后就对着挖出的头骨说了几句话。这一情景在西方文化当中有着深远的传统,尤其是在绘画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主题:“memento mori”,意思就是——记住,你必有一死!这其实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很多基督教徒的墓碑上都会刻上一个头骨图案。很多西方油画尤其是一些表现基督教圣人的作品,很多都会有一头骨在上面。这些头骨就是在提示看画的人——“你的生命是短暂的,肉体可以灭亡,但精神是永生的”。这种观念在整个西方的文学、艺术传统中影响深远。所以,如果把这绘画与文学结合起来讲,读者就会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和体会。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学传统、文人传统不太了解的话,那么在看中国画的时候就很难进得去。有些文人作画是随便点几笔、勾几画就完了,但是它之中的味道与中国传统文学却是密切相关的,不懂文学,是体味不了这些画的。

梁:您的英文著作中有很多内容讨论了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诗歌作品,同时您也把不少中国古诗翻译成了英文,很多人认为诗歌是不可翻译的,好诗更是如此,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大家都知道弗罗斯特说过一句话,“诗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失掉的东西”,但我认为好诗是可以翻译的。如果译者像真正的诗人那样掌握了诗的语言的话,那么他是可以胜任翻译的。不过也有些情况令人很不满意,有些译者本身是诗人,但他对原文了解得不太好,比如庞德,他把中国古诗翻译成英文,很漂亮,但在意义上却相差很远;另外一种情况是,译者虽然懂原文,但他们的英文却不漂亮,没有诗的味道。诗是可以翻译的,只是对译者所掌握的两种语言以及他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的要求非常高。怎么样的翻译才算是好的翻译呢?首先是要保留原诗的意义,不能有歪

曲;其次是这些译作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体会到原文语言诗意的美。

梁:保罗·德曼曾经说:"所有的好诗都是声音的诗而非意义的诗",他强调声音之于诗的重要性,可不同语言之间的诗歌翻译却恰恰是用一种语音来转述另外一种语音,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我认为诗的"好"既体现在声音上,也会体现在意义上,缺一不可。声音当然无法复制,但通过语言技巧来复制它的意义还是有可能的。而且翻译后的诗也是有声音的,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同样有可能创造出好诗。在这个意义上,诗的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造。

梁:您在《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一文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您对"经典"的看法,您赞成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经典应该是"无时间性"的,即它们能够超越时间的距离对读者当下的生活形成影响[1] 180—181。但我们也会看到某个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换个地方之后,往往会受到冷落或忽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我认为这里其实反映的还是一个文化不平衡的问题。我们的大学生都知道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也都知道他们的经典作品,可美国大学生中大概就很少有人知道有李白、杜甫或李商隐这些中国诗人了。西方学生也许知道孔子,但对其他人就非常陌生了,这其实就是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一般西方人觉得没有必要来了解我们这些古老的文化。反过来说,我们中国学生知道非洲的经典吗?知道阿拉伯的经典吗?我们也不知道。难道非洲和阿拉伯的文学传统中就没有经典?其实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的注意力也总是在向强势的西方文化看齐。近代的中国,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成了强者,我们成了弱者,这种向强者看齐的情形就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我相信这种情形会逐渐得到改变,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肯定会越来越感兴趣。我在很多观点上和宇文所安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而且是正确的,那就是把不少中国诗歌翻译成了英文并把它们收入了美国大学的教材当中,这样,很多美国大学生就能直接读到中国的经典作品了。所以,这不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是权力不平衡的问题。

梁: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经典往往代表了这些文化曾经达到过的最高的精神境界。您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对中西方文学中的传统经典的引用比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要多得多,为什么?

张:什么是经典呢?我们还是从钱锺书先生那里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吧。有不少人曾经拼命地贬低钱先生的学问,认为他这有问题,那有毛病。其实这种贬低前人,贬低前代的伟大诗人的情况在中国历代都有。唐朝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李白、杜甫大为不屑,韩愈看不下去了,才写了《调张籍》这首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这首诗骂的就是当时一些贬低李白、杜甫的小人。其实杜甫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时间比韩愈要早。韩愈赞扬的是李白、杜甫,而杜甫要称颂的是"初唐四杰"。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你们这些批评"初唐四杰"的家伙身与名都毁灭了的时候,"王杨卢骆"的经典作品还仍然存在,并且会像奔流不息的江河一样万古长存,这话骂得比韩愈还要厉害。

其实,杜甫在这里就说出了什么是经典。经典是那些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作品,时间就像河水一样不断地流走,大浪淘沙,最后得到的才是经典。时间可以铸造经典,也会淘汰很多次品,经典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同时经典也不是由政治、环境或其他什么因素决定的。在大学里,老师会给学生开出很多经典的书目,但也并不因此就证明那些书就是非读不可的经典。一个人真正需要阅读的经典并不一定是老师可以安排的,而是在自己的内心觉得很好的、非读不可的书,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种完全自我的选择。

那么,当代有哪些作品可以算是经典呢?我想用来评价它们的时间还太短暂了,它们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究竟哪些是经典还很难讲。艾略特曾经在《传统在现代的意义》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一部新的作品出来以后,你要拿它与传统中所有的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进行比较,然后再判断这部新的作品到底有没有意义,能不能站得住脚。这种观点是对的。

梁:您的《道与逻各斯》的第三章讲"无言之用",除了陶渊明之外,相对于您在前面曾详细论述的莎士比亚、艾略特、里尔克、马拉美等好几位西方诗人而言,中国诗人中被举例并加以研究的诗人并不多,在我看来这使得您的论证在整体上

似乎显得有点单薄。

张:我在后面论述中国的批评传统时,其实也引述了很多中国诗人和理论家的作品和观点,比如历史上对李商隐的《无题》的多种解释、杜甫的一些作品,并且还补充了《文赋》、《诗品》中的不少观点。在强调"意在言外"的时候,我讲国外的诗人的内容确实要多点,当然也不全是从诗人入手。如果一定要有所区分的话,我们不应该笼统地讲西方。莎士比亚是英国人,艾略特是美国人,里尔克是德国人,马拉美是法国人,这些诗人分属于不同的文学传统,其实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当然,我现在也认为如果当初能够多举些中国诗人的例子的话,论证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代表着英语文学的两座高峰,美国大学生对这些经典的英语文学还有兴趣吗?

张:我想还是有的,当然也要看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学校。我在哈佛的时候,那里的学生中有不少对这些经典作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后来我去了加州大学,这在加州是研究型的大学了,我发现也有不少学生对他们有兴趣。

梁:国内的大学生、研究生中读经典的人也不多,甚至连文科学生也是如此。

张:大家都在那儿谈理论,可是真正的理论大家对经典却是烂熟于心的,比如德里达,他对西方经典就非常熟悉,可后来他的信徒们却只读他的著作而不及其他,这是很盲目的。

梁:您说得特别对,往往开创一个学派的人是伟大的,而跟随这个学派的人却会越来越无足轻重。真正好的学生,不一定要跟着老师亦步亦趋。

张:对啊,学生应该勇于创新。

梁: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处处要与老师作对的,反而正是如此,柏拉图才更显得伟大。现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之间这种教学相长的关系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

张: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于学生来说,与优秀的老师交往、谈话其实就是最好的学习。师生之间的良好交往是很宝贵的。当然,学生也要有好学的真诚意愿,否则老师单方面有热情也是没有用的。话又说回来,也许研究学问本来就不需要太多人,有一部分人能够真诚地对待学问,就已经很不错了。

梁:您的知识面非常广博,论文、专著也常常涉及历史、宗教。我个人非常喜欢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些书中往往可以看到很多现代的东西。"9·11"之后美国总统布什的讲话其实很像是伯利克力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美国人有时候似乎比欧洲人更加自觉地认为自己延续了西方的伟大传统。

张:欧洲其实比美国要复杂得多,也多元得多,欧洲人在以前也认为自己是西方文化的继承者,但美国现在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因此美国人当然就有理由把自己当作希腊的雅典,或希腊之后的罗马了。我在下乡的时候读过不少希腊文学作品,《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也都读过,确实很有意思。历史非常重要,无论我们做什么研究都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知道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文学更是如此。

梁:您也曾经在《历史与虚构:文学理论的启示和局限》这篇论文中专门论述过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修昔底德极力想写一部纯粹的历史、一部与《历史》不同的历史,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文学叙事,因为历史不可能离开文学虚构。这篇论文给我启发很大,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关于历史的论文?

张:这篇论文最初也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英国的 Rethinking History上[2],重写成中文之后就成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的最后一章。我2010年会在美国的 History and Theory(《历史和理论》)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章我已经写好了,2010年2月份会出来。两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与这篇论文有点关系,但只是论文的很小的一部分。葛兆光教授在复旦组建了"文史研究院",他请我去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庐山面目"。我借用苏东坡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讲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主要探讨了美国学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同时也对美国学界的一些不同的历史研究范式作了些评论,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梁:谈到美国历史学界的问题,现在张光直先生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您在哈佛留学的时候应该与他比较熟吧?

张:我一去哈佛就认识了张光直先生。他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中国文明不是一个从黄河流域向外辐射而形成的一元化的文明,而是多元并存的。这是从考古发现上可以找到证据的。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其他地区,都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

址, 中国文明的起源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 而是多元的, 然后才逐渐发展出后来的形态。这对以往传统的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明源于中原的说法只是非常符合一种正统的中国文明观而已。

梁: 文学与宗教也充满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您还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宗教意识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 并引用了张灏先生关于“幽暗意识”的观点, 用您自己的说法是这种“幽暗意识”最终开出了西方现代民主这个“果”出来[1] 212。有意思的是, 我去年在上海开会时, 墨子刻就批评张灏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幽暗意识, 他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教, 才可能理解什么是幽暗意识。

张: 我完全不赞同墨子刻的这种观点, 张灏提出的“幽暗意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他自己也引用了很多西方政治哲学家、思想家的看法来论证这种观点。起码从奥古斯汀之后, 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就有一种“罪恶感”, 这与后来的民主是有关系的, 这在西方其实已经成为了常识; 另外,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与现代民主的关系在西方也已经讲了很久了。这些都不是张灏一个人的发明, 只是张灏引用了它们来谈中国的问题而已。张灏的意思是中国人的思想里缺乏幽暗意识, 他其实是反对新儒家提出的要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找出现代民主的观点, 他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墨子刻这样随便说别人不懂西方的宗教, 好像只有西方人才懂似的, 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 其实不见得每个西方人都很了解自己的文化, 我当时如果在场的话, 一定会反驳他的。

梁: 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一部了不起的理论著作, 它的第一章讲《圣经》与荷马史诗叙事模式的对比, 非常精彩, 这部分内容有没有对您在《讽喻解释》中比较《诗经》与《雅歌》的差异时产生过什么影响?

张: 这倒是没有。《摹仿论》的第一章讲了西方文学两个重要的来源: 希腊和希伯来,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对西方文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摹仿论》的第一章确实相当精彩, 也很重要。奥尔巴赫分别从《圣经》和《荷马史诗》取两段文章来谈论叙事的问题, 从具体的文字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有点像钱锺书先生的做法。奥尔巴赫指出《旧约》文体的特点是文字非常简略, 很多东西都不会明确说出来, 但能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和阐释余地。在某种意义上, 这很像中国传统的文体。很多人把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 认为西方文学的叙事特色是清楚明了, 而东方文学则是隐晦、模糊, 其实《圣经》文体同样是非常简略的, 充满了象征、暗示这类隐晦含蓄的手法。

参考文献:

[1] 张隆溪.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 Zhang Longxi. History and Fictionality: Insights and Limitations of a Literary Perspective[J]. Rethinking History, 2004, 8(3): 387－402.

(责任编辑　周仲器)

Literature has Never been Very Important

Zhang Longxi[1], Liang Jiandong[2]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has a lasting charm beyond ages, and no development wheth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business will abate its appeal to mankind. Both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literary canons stand for the peaks of man'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orth conning by modern reader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hould take in the fruits in such humanistic fields as religion, philosophy so that its ken can be enriched and broadened, and its value be raised.

Key words: literature; literary canon; historical narration; religion